

引言

歷史，女性和中國的抗日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美國、歐洲以及亞洲其他地區，口述歷史在二戰史研究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但中國與二戰史的研究中，尤其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婦女史的研究，口述歷史並不多見。現存關於抗日戰爭的學術著作大都傾向於關注重大歷史事件和從事政治活動的男性歷史人物，研究的框架也多以男性經歷為中心，強調以男性經歷為基礎的戰爭衝突理論。相對而言，有關個人回憶的口述歷史，特別是普通婦女的經歷，以及這些經歷提供的歷史啟迪，很少能夠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本書是一部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婦女的口述史，目的不是為了將抗日戰爭女性化並進而將其人性化和正常化，而是展示抗日戰爭中，中國婦女，特別是重慶婦女的經歷。我認為戰爭本身並不能賦予婦女力量，使她們變得強大；而是反抗侵略使中國婦女經受了磨練，獲得了力量，變得強大。

本書有三個主要目標。第一，它旨在將口述歷史和個人回憶引入婦女和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之中。它關注的是1938年到1945年期間，生活在國民黨控制下的戰時陪都重慶的婦女的生活，以及她們各種各樣的戰時經歷。本書記錄了35位中國婦女的口述歷史，她們都是抗日戰爭的倖存者，她們的故事都是作者通過採訪收集而來的。將這些戰爭記憶注入

抗日戰爭研究中，其目的與美國歷史學家David Thelen在關於「記憶與美國歷史」的研究中提出的觀點是一致的：

研究歷史記憶能提供令人振奮的新機遇，使我們能夠對傳統的史料和研究課題提出新問題，作出新的綜合分析。因為對歷史記憶的研究能將專業化及特殊化的題目聯繫起來。有關歷史記憶的問題，通常自然地來源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經歷，它可以連接史學界和認為專業歷史同現實生活距離太過遙遠而無法觸及的廣大受眾。¹

著名英國歷史學家E. P. Thompson在關於英國工業化和工人階級研究的開山之作中也告誡我們，要通過吸收和認可普通群眾的個人經歷來擴充我們對過去知識的認識。²在中國抗日戰爭歷史中，普通婦女作為一支社會力量，一直以來不僅沒有話語權，而且常常被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忽視。

口述史對還原歷史記憶非常重要，因為它特別能揭示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受壓迫人民的經歷。例如，研究中國抗日戰爭的學者們都知道，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物資嚴重匱乏，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及生存造成了極大影響。重慶檔案館和歷史圖書館所藏大量文獻資料可以證明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物資短缺，但是文獻數據無法告訴我們，物資短缺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口述史則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到目前為止，有關普通中國人抗日戰爭經歷的文獻很少，抗日戰爭時期普通人的歷史數十年來都未受到學者的重視。故而，口述歷史對於普通中國人，特別是婦女的戰時經歷的重塑是十分重要的。口述史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抗日戰爭時期社會性別的差異化和戰時社會的政治生活，還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其他方面的社會結構不平等的問題。

1 David Thelen, "Memory and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4 (1989): 1117-1129.

2 Edward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美國傑出的女性問題專家Joan W. Scott指出，如果仔細研究婦女在戰爭中的經歷，尤其是那些以口述歷史為根據的部分，我們很快會發現戰爭造成的巨大傷亡和對普通人權力的剝奪。在口述史中，婦女的經歷與官方為動員全國支持戰爭而強調的英雄主義和英勇無畏的宣傳形成鮮明的對比。³同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史中也存在個人經歷與官方宣傳之間的差異。本書記錄的口述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抗日戰爭存在至少兩個版本的故事；在抗日戰爭中，國民情緒也同樣存在兩面性。一方面是官方版本公開宣揚的、全國人民以高昂情緒投身於抗日戰爭的故事；另一方面則是鮮為人知的個人經歷，以及被死亡和痛苦籠罩著的民族悲哀。我們往往認為官方樹立的英勇抗日戰爭形象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全盤接納，卻忽視了承載戰爭和這種官方形象的個人所遭受的苦難。

我需要在此申明，本書口述史揭示婦女在抗日戰爭中遭受苦難的目的，並不是要將中國婦女塑造成被動的、可憐的受害者角色。一般來講，在世界戰爭史和暴力衝突中，婦女經常被描述成悲痛無助的母親和妻子。但是近年來一些關於南亞武裝衝突及美國二戰時期的婦女研究，都顯示了婦女在戰爭中有著多種多樣的形象，扮演過各種不同的角色。本書的口述歷史也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婦女有著多面的形象——她們是動員、宣傳、支持抗日戰爭和戰時生產的積極分子，也是抗日戰爭期間性暴力和經濟困難的受害者，還是生存策略策劃者和家庭社區事務管理者。以往在對軍事暴力衝突的學術研究中，婦女在戰爭中的各種個人經歷往往因為得不到認同而被忽視。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將這些被忽視的個人故事，引入學者的研究視線，讓普通婦女也有屬於自己的公開話語權，並且「使她們的經歷

3 Joan W. Scott, "Rewriting History," in *Behind the Lines: Gender and the Two World Wars*, ed., Margaret R. Higonnet, Jane Jenson, Sonya Michel, and Margaret Collins Weitz.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8.

滲入公共領域」，寫進歷史，而不再僅僅是與歷史無關的個人故事。正如印度學者 Rita Manchanda 對南亞武裝衝突中婦女的描寫，我們應當把本書中的婦女的經歷，看作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學術資源和空間。⁴

本書希望這 35 位重慶婦女的個人故事可以使我們進一步了解普通婦女如何應對抗日戰爭，度過日復一日的戰時生活。一般的抗日戰爭史很少涉及人文維度的討論。美國歷史學家 Parks M. Coble 指出，在現存的學術研究中，抗日戰爭的人文維度往往被忽視了。⁵ 認識抗日戰爭的人文維度，可以幫助我們對抗日戰爭史有更全面的了解。戰爭的人文維度的主要觀點是：戰爭是由人造成的，對戰爭影響最大的是人，受戰爭傷害最大的也是人，特別是普通人。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婦女的經歷，可以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人文維度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並幫助我們認識人與戰爭的關係。只有當人們深刻意識到人與戰爭的關係時，人類才有可能減少或消滅戰爭。

總的來說，接受採訪的重慶婦女們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教育背景。不同的政治因素使她們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抗日戰爭，並留下了不同的記憶。然而共同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她們，又或多或少地擁有某些共同記憶。這些記憶不僅使這些倖存者的故事有生動的細節，也向我們展示了她們對抗日戰爭的情感和看法，從而了解到這場戰爭對於她們每個人分別都意味著什麼。第一手的回憶資料，正如美國學者 Philip West、Steven I. Levine 和 Jackie Hiltz 所指，「對表達戰爭的意義和形式都是無價的」。⁶ 這 35 名重慶婦女的個人回憶提供了有關抗戰期間大後方私人領域

4 Rita Manchanda, ed., *Women, War, and Peace in South Asia: Beyond Victimhood to Agency*. New Delhi: Sage, 2001, p. xiv.

5 Parks M. Coble,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China Quarterly* 190 (2007): 394–410.

6 Philip West, Steven I. Levine, and Jackie Hiltz, ed., *America's Wars in Asia: A Cultural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p. 12.

的許多具體信息，這在中國抗日戰爭研究中尚屬一個相對空白。我認為只有當公共的故事和私人的故事都講出來，文字記載的歷史和口述的歷史都寫下來，我們才能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經歷的史實有更深入完整的理解。

中外學術界對於歷史和記憶在戰爭研究中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已經做了大量研究。然而，一般而言，現存有關二戰歷史與記憶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幾個重大的問題上，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廣島、長崎遭受的原子彈襲擊和南京大屠殺等。上述研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本書也不是要否認其重要性，而是想指出史學界也應當關注那些普通的、沒有那麼富有戲劇性的戰爭題目。之前西方出版的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著作大都集中於研究以男性為中心的軍事歷史，如戰時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文壇精英創作的文學作品，以及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分別在國統區及紅色根據地從事的現代國家建設。由於現存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著作大多都未包含普通人民的聲音，這35位重慶婦女的口述史，以及她們帶給我們的戰爭記憶，就如南非社會學家Belinda Bozzoli在她的研究中提出的一樣，是用一種非完美的方式重現了歷史，並為學者們提供了一條了解什麼才是抗日戰爭「真實」面目的途徑。⁷

在現代婦女研究中，西方學者們早就提出了「個人的就是政治的」觀念。女性私人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往往反映出政治和社會中複雜的權力關係。不同身分的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的個人故事重新展現出當時的物質條件、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生活，以及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精神狀態，使我們能以非正式的、感性的和生動的方式了解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陪都的各種政治權力關係。例如，我們知道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大後方，抗日戰爭時期通貨膨脹和經濟困難的情況十分嚴峻。雖然現有的學

7 Belinda Bozzoli, and Mmantho Nkotsae, *Women of Phokeng: Consciousness, Life Strategy, and Migrancy in South Africa, 1900–1983*. London: Heinemann, 1991, p. 6.

術著作都以醒目的統計數據記錄了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的通貨膨脹，但我們往往無法從生硬的數據中知道這對當時的普通人到底意味著什麼，對他們的生活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本書口述史中普通婦女們對抗日戰爭時期重慶通貨膨脹的個人敘述，則提供了具體而生動的情節，幫助我們了解抗日戰爭時期通貨膨脹和經濟困難帶給普通人民的巨大痛苦。而抗日戰爭時期普通民眾經歷的經濟及生活困難，以及他們應付這些困難的方式和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們揭示了普通民眾與國統區政府的關係。

1980年代以來，歷史記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在西方的中國史研究中，集體記憶及公共領域也是流行的研究題目。很多學術著作和學術會議都在致力研究，用西方學者Richard Madsen的話來說就是，「使一個小團體融入一個社區的集體記憶」，⁸或如David Thelen所指出的，「探索個體如何與大歷史進程聯繫起來的新的可能性」。儘管Madsen指出，大多數關於公共領域的研究都聚焦在非政府的民間社會，但我認為這些研究主要還是試圖把個體融入整體，並強調整體的重要性和體現團體的特徵。這種研究往往忽視了個體如何將歷史進程個人化，個人經歷和民族歷史是相互影響並呈交叉狀的。抗日戰爭倖存者的口述史資料可以幫助我們從多個層面了解到抗日戰爭中個人歷史和民族歷史的交叉性，而不僅僅局限於個體與個人記憶是怎樣被融合進整體和公共歷史中。

實際上，這35位中國婦女的個人記憶向我們揭示出陪都大後方形形色色的面目，既包括了英勇的全民抗日戰爭，也顯示了戰時社會的混亂，以及不同人群對抗日戰爭意義的理解和衝突。與歐洲和美國在二戰時期發生的情況類似，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婦女共同記憶和個人記憶之間也同樣存在差異。雖然抗日戰爭時期的檔案資料和婦女刊物記載

8 Richard Madsen,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19.2 (1993): 183–198.

和發表了許多有關婦女的資料，但這些文字記錄多半代表集體記憶。雖然它們也反映了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經受的磨難和面對的挑戰，但基本腔調仍屬於激昂的官調，目的是為了尋求全民對抗日戰爭的支持，故而強調英雄主義和英勇無畏的民族形象。譬如，1937年應澳大利亞某刊物要求，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寫了一篇名為〈戰爭與婦女〉的文章。在該文中，她對全世界說：自抗日戰爭爆發以來，中國各界婦女都積極奮發地為支持抗日戰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領袖，建立起各種組織機構，為抗日戰爭提供協調和協助，與此同時，女服務員和舞女則紛紛到醫院和慈善機構當志願者，普通家庭婦女也都自覺自願地照顧流浪兒童。在宋美齡看來，正是這場戰爭將中國婦女不會誇誇其談、只會努力做事的優秀品質表現了出來。⁹在她的公開演說中，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時遭受的苦難被褒揚成民族英雄主義和中國人民頑強生命力的體現。

西方學者 James M. Mayo 指出，任何社會在戰爭時期都需要將其集體的戰爭記憶神聖化，以此證明人民血和犧牲都是有價值的。這種流血犧牲被用作「社會之精神支柱」以掩蓋發動無人道戰爭的國家形象。¹⁰與此相反，本書的目的則是避免把戰爭記憶神聖化。本書中的口述材料，即那些個人的抗日戰爭記憶，不僅僅揭示了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同時也記錄了戰爭造成的家庭成員死亡和人民的苦難，也就是戰爭的無人道性。戰爭會造成流血犧牲，就算是正義的、反抗侵略的抗日戰爭，受傷害最多最大的也是普通中國老百姓。正如 Joan W. Scott 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私人與公共空間、家庭與國家、母親們的需要與國家的需要、個人的犧牲與國家的存亡之間的差異，對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意識的

9 宋美齡，〈戰爭與中國婦女〉，《蔣夫人言論匯編》，蔣夫人言論匯編編輯委員會編。台北：中正書局，1956，第77-85頁。

10 James Mayo, "War Memorials as Political Memory," *Geographical Review* 78.1 (1988): 75.

形成是至關重要的。」¹¹ 想要對婦女的戰時經歷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有更深入詳細的理解，關注集體記憶和私人回憶之間的差異尤其重要。這種差異會幫助我們了解社會性別在抗戰時期的表現和抗戰期間各種政治思想運動的複雜性。

本書的目的之二是展示中國的抗日戰爭史實際上是一個社會性別化的課題。現存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西方著作幾乎都沒有涉及抗戰時期重慶婦女的經歷，因此，知識構建過程中包含的女性視角和見解也就遠遠不夠完善。將抗日戰爭中重慶婦女的故事納入歷史敘述，不僅給予她們話語權，更補充與挑戰了有關抗日戰爭的知識的構建政治。印度學者 Rita Manchanda 在關於南亞戰爭中的婦女的研究中指出，一旦婦女們遭到暴力衝突，就會創造出特殊的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及國家等方面的現實條件，並逐漸演變成一門新知識的基礎和源泉。¹² 只有當女性為中心的故事獲得一定的空間和地位，婦女才能成為知識構建過程中的一員，從而使我們能有更充實的知識基礎，了解更完整的抗日戰爭歷史。本書從近現代史上在暴力衝突中主張男女平等的學術成就中，借鑒了一些觀點及見解，並利用男女平等理論及其社會性別分析方法作論證，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抗日戰爭時期社會性別關係在重慶地區的演變，也能提供關於中國抗戰史研究中，以女性為中心的另一種視角和版本。

本項研究還試圖探討抗日戰爭中「社會性別」與集體及個人記憶之間的關係和區別，展示並講述戰爭期間「社會性別」的形成和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本身的複雜性。本書記載的重慶婦女在烽火歲月裏的故事，告訴我們在探尋社會性別標誌的過程中，如同歐洲和美國婦女在二戰中一樣，中國婦女也必須得在公共和私人需求之間、國家與家庭之間、國家需要和個人需要之間、國家存亡和個人生死抗爭之間，以及社會劃分給男性的陽剛英雄主義與給婦女的陰柔韌性之間不斷博弈。

11 Scott, "Rewriting History," p. 28.

12 Manchanda, ed., *Women, War, and Peace in South Asia*, p. 20.

本書的口述記憶揭示出，儘管全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都飽受磨難，但這種磨難帶有社會性別差異。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的婦女經歷了許多女性特有的苦難。比方說，戰爭期間極端艱辛的生存條件，使很多母親在戰爭中失去自己年幼的孩子；許多婦女在戰爭中承受了加倍的生育之苦；有些婦女則由於生活艱難、社會動亂，根本無法考慮生育兒女。再如，儘管抗日戰爭前後，中國都存在著對女性的性侵害及性虐待，但戰爭造成的混亂卻使許多婦女更易成為兩者的目標。在西方，婦女在軍事衝突中遭受的性暴力，尤其是近三十年來在世界各地軍事衝突中飽受的蹂躪，已經受到學者關注。近年來以婦女在戰爭中遭受的性侵犯為主題的學術研究已成為熱門話題。然而相比之下，以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經受性迫害為主題的學術研究卻寥寥無幾。現存關於抗戰時期中國婦女遭受性暴力的中英文著作，大都將焦點集中在參戰士兵對中國平民婦女的性暴力上，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殺中遭受日軍強暴的婦女和在日軍中飽受性虐待的慰安婦身上，而對於婦女在抗日戰爭中非軍事區域裏遭受的其他形式的性侵犯和性虐待卻極少有人關注。本書收集的口述史中至少有三位女性（劉群英、趙知難和任再一）提到了親身經歷和目睹過的男性對女性的性侵犯，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吸引學者注意並從事該類課題的研究。

我們也應當注意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普通婦女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及其對抗日戰爭和國家的貢獻。美國學者 Deborah Halstead Lennon 在她關於婦女研究重要性的思考中指出，婦女對社會（在這裏指戰爭）的貢獻通常都錯綜複雜地交織在日常生活中，並被日常生活所掩蓋，以至於現存的學術研究對這些貢獻都視而不見。婦女們的日常生活對學者們來說太過熟悉，也太過普通了。¹³ 現存有關抗戰時期重慶婦女的工作和貢獻的公開

13 Deborah Halstead Lennon, "Why Women's Studies?" in *Women: Images and Realities*, ed., Amy Kesselman, Lily D. McNair, and Nancy Schniedewind. California: Mayfield, 1995, pp. 31-32.